

中日韩军事安全合作的困境与出路

刘 强

【内容提要】特殊的地缘政治关系和历史宿怨等问题，使得中日韩三国军事安全困境并未消除，甚至有所加深。制约中日韩军事安全合作深入发展的最大障碍，既有现实的领土争端问题，也有互信的缺失和国家情感与民族情绪问题，更有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同盟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而消除中日韩安全困境的途径尽管存在但难度极大，这种状况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三国间军事安全合作的深入发展。但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三国也的确存在着共同的安全利益，只要三国能够在以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问题上达成共识，真正拥有超越历史积怨的未来视野、超越冷战思维的战略智慧和超越自我的勇敢和自信，三国在一些关乎世界安全的重大领域中的军事合作仍然存在可能，尽管这种合作可能是有限的，但仍能为维护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发挥重大作用。

【关键词】中国 日本 韩国 军事合作 安全困境 解决途径

【作者简介】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8年12月中日韩三国领导人曾共同签署了《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明确了未来三国的发展方向，但其中并未包含军事合作内容。直到2010年5月29日在韩国济州岛举行的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后通过的《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中，才开始明确提出了“我们将探讨建立‘三

国防务对话’机制的可能性，以加强安全对话，促进三国防务或军事人员的交流合作”。^①然而，2010年以来的朝鲜半岛复杂局势以及一些突发事件，使得三边关系特别是军事关系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伙伴关系”基本上停留在以经济为主的非传统安全领域，而具有实质性的军事安全合作则基本上处于口惠阶段。事实上，特殊的地缘政治关系和历史宿怨等问题，致使中日韩三国军事安全困境并未消除，甚至有所加深。要想找出有效解决途径，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和自信。

一、中日韩特殊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军事安全困境

通常“安全困境”（或“安全两难”）被解释为：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中，是指一个国家为了保障自身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反而会降低其他国家的安全感，从而导致该国自身更加不安全的现象。一个国家即使是出于防御目的增强军备，也会被其他国家视为需要作出反应的威胁，这样一种相互作用的过程是国家难以摆脱的一种困境。^②事实上，这个国际政治术语的核心体现在军事领域，因此，中日韩间的“安全困境”更多体现在军事问题上。

中日韩三国的地缘政治属性，使得三国即便在非全球化时代也存在着无法割裂的紧密关系，而全球化将三国关系推向更加紧密阶段，经济合作不断加深，贸易额不断攀升。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统计，2010年中日两国间的贸易总额为3018.5亿美元，与2009年相比，增长率为30%。同某一贸易国的贸易总额超过3000亿美元，在日本历史上尚属首次。^③中韩贸

^① 《2020 中日韩合作展望》，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GB/11777615.html>。

^② 互动百科，<http://www.hudong.com/wiki/%E5%AE%89%E5%85%A8%E5%9B%B0%E5%A2%83>。

^③ “2010 年中日两国贸易额增长 30%，创下历史新高”，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o/2011-02-19/092721980125.shtml>。

易额2010年达到2072亿美元，同比增长32.6%，与建交时相比已增长了40倍。^①日韩间2009年的贸易额也达到6.46兆日元。^②如此庞大的贸易额，使三国成为亚洲地区乃至世界的重要经济区，也使三国领导人萌生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设想，三国联系之紧密、关系之重要，由此可见一斑。

尽管从国家关系发展的角度看，经济上的良好关系和利益捆绑必然导致其他关系的顺利发展，从而导致安全指数的升高，正如从煤钢联盟起始，曾使欧洲大部分国家最终走向联盟道路，从此远离多年的争斗甚至战争。然而东亚的现实却并未如此简单。中日韩复杂的三角关系，并未因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而导致政治、军事关系的良性合作与发展，相反却导致了军事领域安全困境的加深。

首先，中国军力提升迅速导致日韩备感紧张，纷纷加大军备投入力度。出于维护中国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需要，“反台独应急作战”准备的拉动，近年来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DF-21D导弹和歼10战机等一批高精尖武器装备不断研发成功并陆续装备部队，北斗区域卫星导航系统的基本系统建设的完成，歼20战机的试飞，前苏联“瓦良格”号航母的翻新等都是具有标志性的军事发展成果。凡此种种，无一不让日韩两国感到原有的东亚地区军事力量平衡被打破，自身安全指数下降。其中有关航母问题，日本《朝日新闻》报道称，“中国已决定在全国开展航母计划，其中包括在2014年建造常规排水量为5-6万吨的航母，2020年建造核动力航母”。^③特别是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日本人更感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因为，日本人认为，“台湾海峡地区一直是美军第七舰队的势力范围，中国的军事存在被封锁在台湾墙的内侧”，但是，由于“台湾墙”

^① “韩国总理：期待韩中贸易额在2015年达到3000亿美元”，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4/13/c_13827413.htm。

^② “最近の日韓関係”，日本外務省，<http://www.mofa.go.jp/mofaj/area/korea/index.html>。

^③ “美称中国反航母导弹已可实战，国产航母2014年亮相”，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mil/2/detail_2011_04/14/5734812_2.shtml。

的倒塌，“中国海军和空军的活动范围正在向西太平洋扩展”，且“中国军力的增强是陆海空全方位的”。^①不仅一般的日本学者，日本的官方研究机构同样如此。2011年3月由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编撰的《中国安全战略报告》中称：“作为对东亚地区的安全保障环境产生很大影响的重要因素，人民解放军军事力量的迅速现代化引发了地区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关心。”其中，“以充裕的国防经费为后盾，人民解放军正在更新旧式装备，不断引进最新装备，切实地推进着装备的现代化”。报告根据一些所谓具体事件，称中国“有关对外政策和军事力量装备的正式说明，与人民解放军等实际动向的不一致，使东亚各国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未来的方向性感到不安”。^②而事实上，日本政府已将中国锁定为现实敌手，这不仅体现在2010年版《防卫白皮书》中长达十几页的描述中，也反映在2010年底公布的推迟了一年的新版《防卫计划大纲》中。如果说《防卫白皮书》对所谓“中国威胁”还有些遮遮掩掩的含蓄表达，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则对此表述得十分明确和直白。其中针对“中国向海洋进军”要实施“动态防卫”和向西南方向的“空白地带”的岛礁派遣小规模部队加强守护和监视能力等新构想，以及从未来武装装备的发展规划看，减少陆上作战装备，重点加强海上装备建设等，^③都是重点防范中国的最好佐证。可见，中国的快速崛起引起日本方面的极大关注和不安。

其次，朝鲜核试验导致日韩危机感增加。朝鲜的两次核试验，以及“天安舰”和“延坪岛炮击”事件，使得日韩两国的不安全感增加。这点从事

^① 金子秀敬：“台湾墙的倒塌——中国渴望军事扩张”，日本《经济学人》周刊，2010年12月21日。转引自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0-12/29/c_12929650.htm。

^② 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编：『中国安全保障レポート』，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编，平成23年3月，p.2-3。

^③ 新大纲明确提出将自卫队潜艇数量从16艘增加到22艘，护卫舰由47艘增至48艘，并将具备反导能力的宙斯盾舰数量从4艘增加到6艘。而强调防御的坦克则从现在的600辆减少到390辆，火炮由600门削减至400门。此外随着运输机的大型化，自卫队主要战机由350架减至340架。

件后日韩两国均纷纷加强武器装备建设的言论和实践中即可看出。特别在朝鲜发展核武器和运载工具问题上,日本表现出极大的专注,认为“是对我国安全的重大威胁”且“断然不能容忍”。^①而韩国对朝鲜的防范意识更加强烈,2011年4月15日韩国政府消息人士表示,韩国将投资2至3万亿韩元,到2015年推进建设韩国自己的导弹防御系统(KAMD/ Korea Air and Missile Defense),以防范朝鲜弹道导弹日趋严峻的威胁。而在此之前,韩国军方还曾表示计划2012年左右引进相当于KAMD“眼睛”的以色列弹道导弹预警雷达(2800多亿韩元),并建设相当于KAMD“大脑”的弹道导弹作战指挥所(210亿韩元)。^②

第三,日韩双方因领土与历史问题导致的猜忌,致使日韩相互防范心理很难从根本上消除。尽管日韩双方在许多重大地区和国际问题上拥有共同利益,可以结成暂时“同盟”,但在领土问题上的争执则使得两国关系一直存在问题,而在军事问题上更是互相戒备。根据日本《宝岛》杂志近日登出的“世界前50大军力排行榜”,综合排名前5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是美国、韩国、英国、中国和印度,而日本排在第22名。^③这种将韩国排名如此靠前的做法,尽管有排名方式的原因,但从一个侧面也可看出日本人眼中韩国的军事实力强劲带来的现实压力。

总之,上述情况导致日韩两国都在加大军备的采购力度。以日本为例,尽管受大地震和海啸影响,日本经济必将受到一定影响,政府财政也必将吃紧,但防卫省依然坚持称“必须为老化的F-4战机配备接替机型,力争

^① 日本防卫省:【平成22年版·日本の防衛·防衛白書】,防衛省, 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2010/2010/index.html。

^② “韩媒称韩国2015年将建成导弹防御系统,可拦截朝鲜导弹”,环球网,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4/1633542.html>。

^③ “捧对手贬自己,日本媒体乱评世界军力藏有内情”,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7-02/03/content_5689112.htm。

根据2010年年底制定的新《防卫计划大纲》最终购入约40架新战机”，^①而海上自卫队正计划引进美国正在制造的“高速运输舰”以应对夺岛作战。^②此外，日本防卫省防空系统研发部门主任吉冈秀正中将2011年3月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日本自2009年以来已经在隐形战机研发计划上投入约4.73亿美元，命名为“心神”的原型机已经试飞成功。^③这些都显示出日本在扎实地推进军事装备建设，以寻求与中国的平衡，这是中日韩安全困境加深的最主要原因。同时也充分说明，日韩两国特别是日本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已不仅是心理上的不适应，更多是感到实实在在的战略威胁，即三国原有的军事平衡出现变化，中国的军事实力的增强，日韩传统优势的削弱，导致安全感下降，进而战略压力感增强。

二、中日韩军事安全合作的最大壁垒和障碍

中日韩在军事安全合作问题上不仅存在着安全战略思维方面的差异，还存在着一些重大的现实问题，它们成为构筑起三国军事合作的最大壁垒和障碍。

（一）领土等问题

钓鱼岛归属和专属经济区划分问题，均被中日两国视为两国关系发展的重大问题。因为，这关系到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没有妥协的余地，也是最容易引发两国军事摩擦的关键点。

日韩间的岛屿（日本称“竹岛”，韩国称“独岛”）之争同样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最大障碍。2011年4月，韩国开始着手在该岛屿建设“综

^① “日本下一代战机锁定三款机型，重视隐形能力”，全球军事网，<http://www.militaryy.cn/html/51/n-60251.html>。

^② “日本自卫队欲购高速运输舰用于夺岛作战及救灾”，全球军事网，<http://www.militaryy.cn/html/76/n-57276.html>。

^③ 参见“日本国产隐形战机预计2014年首次试飞”，全球军事网，<http://www.militaryy.cn/html/50/n-57050.html>。

合海洋科学基地”。对此,尽管由于韩国在日本大地震中给予了日本“热情的”援助,日本对如何应对感到纠结,担心过度反应会损害日本形象,但仍表示此事“不能撼动”日本在“竹岛”问题上的立场,表示“我国怎么也无法接受”。^①而韩国在这个岛屿问题上一向表现得十分强硬,且占据实际控制之“优势”,不断加强岛上的设施建设,这必然导致日本不满的增强,从而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特别是政治军事关系深入发展的重要因素。从目前的情况看,日本自民党领土特命委员会2011年4月12日决定向政府提议,针对日韩争议岛屿“竹岛”(韩国称“独岛”)从国家层面制定“竹岛日”,并设立有关独岛问题的专门机构,以抗议韩国政府正在推进建设的独岛“综合海洋科学基地”事宜。^②

(二) 国家情感与民族情绪

尽管从学理上说,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有着不同内涵与外延。但是,当与国家问题相关联时,事实上已经很难将两者分清,或者说,这两者已经成为一个集合体共同发挥作用。由于历史原因,中韩两国对于日本的侵略历史都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而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含糊甚至错误表达与认识,导致中韩民众间蕴含着极大的仇日情感和情绪,一旦遇到某个触

^① 日本外相松本刚明2011年4月12日下午出席了参院外交防卫委员会会议。自民党议员佐藤正久质问松本是否亲自向韩国就其基地建设计划提出了抗议。松本对此仅表示“(向韩方)表达了日本的立场”。他在回答质询时也没有明确答复3月19日的日韩外长会谈是否涉及了竹岛问题。日本外务省的审议官北野充当天早些时候在自民党的“领土特命委员会”会议上说明称:“掌握了韩国方面已就基地建设项目发布招标公告一事。”他没有提出政府的明确对抗措施,表示“我们受到韩国的热情支援,虽然感情上不好受,但不能撼动(竹岛问题)”。此外,日本外相松本刚明15日在众院外务委员会回答自民党议员小野寺典五的质询,就韩国正在岛根县竹岛(韩国名:独岛)推进的“综合海洋科学基地”建设计划称“我国怎么也无法接受”。参见:“‘竹岛’问题考验对韩外交,日本政府进退维谷”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mil/1/detail_2011_04/13/5709278_0.shtml,和“日本外相抗议韩国建竹岛基地,称‘无法接受’”,中国日报网,http://www.chinadaily.com.cn/hqkx/2011-04/16/content_12337102.htm。

^② “日本自民党提议设‘竹岛日’”,国际在线网,<http://gb.cri.cn/27824/2011/04/15/5311s3219028.htm>。

发点就能即刻引发巨大的喷发，并影响至双边关系。例如，2008年7月，因日本宣示竹岛主权引发韩国民众大规模示威，并焚烧了日本国旗以示抗议。而韩国政府迫于民众压力甚至召回驻日大使。这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导致实力增强后的必然反应，更是人们对于国家利益认识上升后的必然反应。尽管极端民族主义或极端国家主义从历史经验看并不可取，但蕴含与中日韩间的国家情感与民族情绪的存在现实，无疑严重制约着国家间关系的理性发展，更为军事安全合作增添了屏障。

（三）互信缺失

尽管中国一再强调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发展”，中国的发展是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处理国家间关系和国际问题应“坚持求同存异，促进共同安全。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观念，大力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①但是，对中国未来发展目标的不确定性导致日韩两国对中国的戒备心理无法放松。“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亚洲的国际关系，也改变了中国内部的力量关系。中国现在站在了十字路口。”^②中国始终强调政治互信是加强两国军事外交关系的重要前提。而日方对此颇有异议，认为中国这种“以政治关系为优先的对日军事外交”，无助于两国防务关系特别是危机管理的实现，甚至可能导致“不测事态”的发生，因此“中国的对日军事外交尚停留在培养政治信赖阶段”。^③同时，认为中国已经开始“从协调走向强硬”，特别是2010年已经成为一个“转换点”，因为“国力增大、自信增强的中国，与美国及周边国家的摩擦增多，为追求

^① “博鳌亚洲论坛 2011 年年会开幕，胡锦涛发表主旨演讲”，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14400156.html>。

^② 金子秀敬：“台湾墙的倒塌——中国渴望军事扩张”，日本《经济学人》周刊，2010年12月21日。转引自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0-12/29/c_12929650.htm。

^③ 参见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編：【中国安全保障レポート】，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編，平成23年3月，p.26-28。

自身国家利益开始采取强硬姿态”。^①而中国对日本加强与美国同盟关系和将中国作为主要战略对手，自卫队的不断军队化和海外化，同样无法视而不见、放松警惕。

（四）美国在东亚的存在以及美日、美韩同盟

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存在，事实上加剧了东亚地区军事安全困境，也导致中日韩军事安全合作较难深入。

首先，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其战略东移并将主要亚太力量部署于东亚地区，^②这不能不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非美国盟友国家的警觉。特别是由于美国对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的态度，直接涉及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中国没有理由坐视国家利益的流失而无动于衷，而在丛林法则尚未退出历史舞台前，加强自身力量建设也就成为必然选择。而美国也一直在为平衡东亚地区的军事力量平衡动作频频，这就更加剧了安全困境的长期化。

其次，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的存在和活动，除了所宣称的为应对朝鲜威胁外，无疑都将中国作为最大的防范目标。加之东亚地区复杂的安全态势，美日韩三国不断加大在中国周边海域甚至接近内海地区进行军事演习的频度和规模，这是导致中国军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导致中日韩间的军事安全合作只能停留在较低层次，难以向深入发展。即便是相对较好的中韩关系，在双方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已从原有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上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是，连日本都认为中韩“两国在安全

^①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編：『東アジア戦略概観 2011』，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編，平成 23 年 3 月，p.92。

^② 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上军事力量主要是第 7 舰队，包括 45 艘各型战舰、180 架各型战机，总兵力超过 6 万人，包括 38000 名美国海军和 22000 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编有 9 个特混编队，即：第 70、71、72、73、74、75、76、77 和 79 特混舰队。第 7 舰队还可根据需要临时组成各种特混舰队：如应急特混舰队、指挥特混舰队、巡逻与侦察特混舰队、海岸支援特混舰队、后勤支援特混舰队、潜艇特混舰队、水面作战特混舰队、两栖特混舰队等等。

保障领域的关系，比之以经济为主的其他领域，尚停留在初步水平”，^①更何况问题更多、关系更敏感与脆弱的中日关系。

此外，尽管由于上述日韩间的问题，至少短期内美日韩很难形成实质意义上的同盟关系，但是，一旦这种战略同盟形成，中国自然会作出应有的反应，从而必将导致安全困境的升级，中日韩军事安全合作显然无法得到实质性发展。

三、中日韩军事安全合作的可能因素与出路

从目前的情况看，尽管中日韩三国间在军事合作上尚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并非不存在三方加强合作的可能性。三国之间在一些重大国际安全问题上总体上存在着一些共识和一致性，而这些共识和一致性，正是三国加强军事安全合作成为的可能的有利因素。

（一）中日韩三国加强军事安全合作的可能因素

首先，在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和打击海盗等问题上存在共识。自“9·11”事件后，国际社会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态度总体开始趋于一致，中日韩三国也不例外。三国共同认识到“恐怖主义对国际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将继续紧密合作，消除恐怖主义”。^②而在打击海盗问题上，即便是对中国海军走向深蓝耿耿于怀的日本，也对中国的表现表示肯定，认为这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安全保障合作的实例”，基于此点，“期待在东亚地区中国也能拥有共同的国际规范，并为此维持与强化作出贡献”，同时“期待中国能真诚并积极地参与以确保东亚稳定为共同目标的对话”。^③

^① 日本防衛省：『平成 22 年版・日本の防衛・防衛白書』，防衛省，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2010/2010/index.html。

^② 参见《2020 中日韩合作展望》，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GB/11777615.html>。

^③ 参见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編：『中国安全保障レポート』，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編，平成 23 年 3 月，p.34。

其次,在参与国际维和行动上存在着一致性。三国都是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维和行动的积极参与国。尽管日本参加国际维和行动的某些动机并不纯正(借参与维和实施自卫队的“走出战略”在此姑且不论),但参与国际维和的热情十分高涨。2010年11月,日本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5个任务区共派遣了266名自卫队员。^①韩国同样是国际维和行动的积极参与者,自1993年6月首次向联合国驻索马里任务区派出由504名组成的营级建制的部队以来,已经参与了众多国际维和行动,仅2007年韩军就在12个国家共派遣了2200名士兵执行维和任务。^②而同样是2010年11月时,韩国在联合国的11个任务区共计派遣了642名军事观察员和维和分队。^③中国自1990年4月首次向联合国中东停战监督组织(UNTSO)派遣5名军事观察员至今,已先后参加了联合国20项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官兵1.8万余人次。先后有3名军事观察员和6名士兵在执行维和任务中牺牲。2011年初,中国共有1958名官兵在联合国10个任务区和维和部执行任务,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派兵最多的(总体看与法国相差无几,排名时有小的变动)。无论是从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历史还是人员贡献上看,中国都处于日韩的排头。仅在2010年11月的同一时期,中国在联合国的10个维和任务区则共计派遣了2040名维和人员,^④分别比日本多出1774人,比韩国多出1398人。从三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情况看,在这一领域,三国有着共同的认识,并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第三,在应对朝鲜核危机问题上存在着利益一致性。尽管三国在针对朝鲜实施核计划以及如何处理该问题的具体细节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

^① *UN Mission's Summary: detailed by Country*, <http://www.un.org/chinese/peace/peacekeeping/contributors/index.shtml>.

^② 参见[美]布赖恩·格罗武:“韩国军队的维和行动”,《美国陆军》,2007年9月刊,转引自中国网, http://www.china.com.cn/photo/txt/2007-09/24/content_8940926.htm。

^③ *UN Mission's Summary: detailed by Country*, <http://www.un.org/chinese/peace/peacekeeping/contributors/index.shtml>.

^④ *UN Mission's Summary: detailed by Country*, <http://www.un.org/chinese/peace/peacekeeping/contributors/index.shtml>.

是，在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和防止战争方面三国仍存在着共识。因为三国均认识到，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并不符合自身的利益。因此认为“朝鲜半岛无核化非常有利于东北亚的持久和平、安全和经济繁荣。为此，我们将继续共同努力，通过六方会谈实现 2005 年‘9·19 共同声明’的目标。”

①

（二）中日韩军事安全合作的出路

首先，必须拥有超越历史积怨的未来视野。这种超越并非专指中韩两国忘记历史，还指日本应该正确反省历史，只有这样才能称之为真正的超越历史和面向未来，这也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真正内涵解读和实践指南，是消除积怨，化解民众相互敌视情绪的解药。

其次，必须拥有超越冷战思维的战略智慧。全球化已经导致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增加。其中在军事安全领域，作为东亚最为重要的三个国家，共同的军事安全利益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只有放弃冷战思维，以宽宏的战略视野和战略智慧，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为准则，以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为目标，才能消除安全困境并在军事安全合作问题上取得新的进展。

第三，必须拥有超越自我的勇敢和自信。由于安全问题本身是客观现实与心理反应的综合产物，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安全困境的产生既是对现实安全形势判断的结果，也是内心世界不安全感滋生的生物。而只有内心的强大，才会导致安全感的增强，安全困境才可能最大限度地消除。更重要的是，只有对安全困境及其带来的问题有清醒的解读，认识到“军事力量的强大并不一定能够完全确保安全指数保持高位。这种悖论正是安全困境的本质特征所折射出的困惑”，^②才能解决互信问题，众多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点。而三国以“加强安全对话，促进三国防务或

^① 参见《2020 中日韩合作展望》，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GB/11777615.html>。

^② 刘强著：《国际军事安全论》，时事出版社，2010 年，第 378—379 页。

军事人员的交流合作”为目的开始“探讨建立‘三国防务对话’机制的可能性”的共识，^①至少使人们看到了一些希望。

结 论

中日韩的军事安全困境是切实存在的，而消除这种安全困境的途径尽管存在但实现起来难度极大，这种状况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三国间军事安全合作的深入发展。这其中，中日关系是关键。日本以实力原则为视角，认为迅速崛起的中国是其地区统治地位和安全的最大挑战者和威胁者。特别是在一些具体问题（领土问题、东海划分问题、历史问题等）上，日本感到中国直接对其构成所谓“现实威胁”，这就使得中国自然成为其主要防范对象。这一点，不仅民主党在台上如此，自民党或其他政党上也将如此。这既是日本固有安全战略思维所决定的，也是现实矛盾所构筑的。因此，中日关系的矛盾是所谓的“结构性”矛盾，不会轻易改变。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中日韩间的军事安全合作涂抹上了悲观色调。但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三国也的确存在着共同的安全利益，只要三国能够在以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问题上达成共识，真正拥有超越历史积怨的未来视野、超越冷战思维的战略智慧和超越自我的勇敢和自信，三国在一些关乎世界安全的重大领域中的军事合作仍然存在可能，尽管这种合作可能是有限的，但仍能为维护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发挥重大作用。

^① 参见《2020 中日韩合作展望》，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GB/11777615.html>。

Sino-Japanese-ROK Military Security Cooperation: Dilemma and Way Out

LIU Qiang (70)

Due to the special geopolitical relations and historical grievances, Sino-Japanese-ROK military security dilemma has not yet eliminated, if not deepened. The greatest obstacles to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tripartite military security cooperation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tangible territorial disputes, the missing mutual trusts, national moods, and the U.S. alliances in East Asia exerting negative impacts. The big difficulty of eliminating the Sino-Japanese-ROK security dilemma refrains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ir security cooperation. However, the three countries share common security interests, thanks to globalization. So long as the three countries reach consensus on the new security concepts initiated by China, transcend historical grievances with a vision on future, transcend the Cold War mentality and transcend egos, it is still possible for them to make military cooperation on important areas in the world security. The cooperation might be limited, but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in East Asia and even the world.

On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BRICs and Its Constraining Factors

LU Youzhi (83)

There was a deep background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BRICs from a business concept to an international regime. The rising of BRICs not only promoted greatly the statu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leading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order into a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but also benefite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world political economical development mode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BRICs should calmly and rationally treat the doubts from western countries about the rising of BRICs, and recognize soberly enough its own problems and restraining factors.